

建安

费振刚◎主编 李景华◎著

诗传 (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

费振刚 主编

建安诗传(上)

李景华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一、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	1
诗 选	
曹 操	
薤露行	118
蒿里行	121
苦寒行	124
步出夏门行	126
艳.....	126
观沧海.....	127
冬十月.....	128
河朔寒.....	129
龟虽寿.....	130
却东西门行	132
短歌行	134
度关山	137
对酒	140
善哉行	142
精列	145
陌上桑	147

曹 丕

黎阳作四首	148
于玄武陂作	156
芙蓉池作	158
寡妇诗(有序)	160
孟津	162
短歌行	164
于谯作	166
令诗	168
至广陵于马上作	169
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	172
清河作	174
代刘勋出妻王氏作	175
杂诗二首	176
燕歌行二首	179
秋胡行	182
善哉行二首	184
丹霞蔽日行	188
上留田行	189
陌上桑	191
大墙上蒿行	193
艳歌何尝行	199
煌煌京洛行	202
钓竿行	206
十五	207

折杨柳行	208
曹 植	
斗鸡篇	214
公宴	215
侍太子坐	217
送应氏二首	219
赠王粲	223
赠丁仪王粲	225
赠丁翼	228
赠丁仪	230
赠徐干	232
离友二首（有序）	235
弃妇篇	238
三良	241
箜篌引	243
白马篇	246
野田黄雀行	249

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

——《建安诗传》前言

(一)、建安诗或建安文学的概念

1. 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

说起“建安诗”或“建安文学”^{〔1〕}，古往今来，绝大多数论者，赞不绝口^{〔2〕}。最早用“建安”一语论述此期文学者，当推西晋的文学批评家挚虞（？—311），在至今幸存的《文章流别论》的逸文里，至少有两条提及“建安”^{〔3〕}。成书于齐末梁初的沈约的《宋书》中的《谢灵运传论》，开始高度评价建安诗或建安文学：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

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与此同时，我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大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昌言云：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

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稍后，我国“诗话”的开山祖师钟嵘，在其《诗品》总序里，和刘勰遥相呼应：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诗文；平原兄弟，
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
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
时矣。

近代学者，一如既往，对建安诗或建安文学的赞美之声，
不绝如缕：

本世纪之初行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开近代中古文学（即今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之先河，曾受到鲁迅先生的推荐^{〔4〕}。其书作者刘师培云“建安文学，革易前型”^{〔5〕}，这是在肯定“建安文学”继承、发展和创造的历史作用。

鲁迅先生认定：“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6〕}所谓“曹丕的一个时代”，是指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批评过的以“建安七子”为活跃分子的建安时期。

郭沫若先生断言“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划时代的表现的”^{〔7〕}。

闻一多先生在其拟议中的文学史《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里，把从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196—755），看作是“诗的黄金时代”。“建安文学”则为黄金时代的光辉起点^{〔8〕}。

笔者业师林庚先生肯定：“这正是承继了先秦时代优良

传统的发展，乃使得巍然的成为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9]

余冠英先生则把“建安到黄初”（即通常理解的“建安”时期），看作是中国诗史的两个突出的时代的第一个，并认为“是一个很突出，很辉煌的时代”^[10]。

“建安文学”目前已经成为各家文学史分期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开端。“建安文学”的光辉成就早已论定。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在前人业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建安文学产生原因、艺术成就、源流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疑点的描述和研究更加周密细致、全面深入的问题。

2. 一个难以取代的概念

用“建安”标明一代文学和一代诗歌，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性。“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即汉献帝刘协（181—234）的最后一个年号（196—219）。我国自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于建元元年（前140）开始使用年号以来，^[11]年号被广泛地使用于文学史的著述之中。如常用的“建安七子”、“元嘉三大家”、“永明体”、“大历十才子”等，直至清末的“同光体”。自然，“建安文学”是一个叫得最响，并被古今多数学者接受的概念^[12]。“建安体”的说法，亦由来久矣。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已云：“方见建安之体，复闻正始之音。”盛唐王维在《别綦毋潜》一诗亦云：“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当然，把“建安体”的含义界定得最明确的是南宋诗论家严羽。在其名著《沧浪诗话》中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13]

“建安文学”这一概念之所以一经使用而千百年来经久不废，在概念的把握上自有它独具的优势。试想一想，如

果换一个说法，比如用“汉末文学”，那么，曹丕篡汉建魏以后的文学创作势难归属，“建安之杰”^[14]的曹植的后半生，不在汉朝，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不是在“汉末”创作的。此其一；而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发轫期之建安文学，开创一代新风，竟在两汉文学之后“貂续狗尾”，也极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此其二。再比如用“三国文学”，也不合适。因为三国的正式形成，在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之后，此时，曹操及邳中七子都已作古。此其一；而且，“三国”之中，蜀、吴几乎无文学可言^[15]，实际只有“曹魏文学”，用“三国文学”，亦名实不副。此其二。那么，干脆用“曹魏文学”吧！也有困难。文学史上完全排除东吴和西蜀，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因为吴、蜀并非在文学上绝对地一无所有。诸葛亮的文章，尽管是实用性的，亦属难得之作。更何况，孔融、祢衡都不属于邳下文人集团，不能说是曹魏作家。最后尚有一个概念可用：“汉末魏初文学”。姑且不说，这一说法不如“建安文学”那么简截明快。就说“汉末”的上限和魏初的下限，就很难界定。“七子”之首的孔融，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名列“三祖”的曹睿，卒于魏景三年（239），他们二人都在“汉末魏初”，范围似乎太大了。

说来说去，唯有“建安文学”这一看似笼统模糊，实则切实合用的概念，最有概括性，最方便使用，致使我们至今沿用它，而没有更好的说法取代它。

至于“建安文学”的具体时限，当然不仅限于献帝刘协最后所谓在位的那二十三年（196—220）。建安文学的前辈是孔融和曹操。曹操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孔融还大他两岁。按常情论，如果以二十岁作为人们从事

文学活动的起点的话，那么，“建安文学”的上限应在公元175年前后，即建安的前二十年，下限应在曹植去世的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前后，在建安之后的十一二年。至此，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建安文人多已谢世，只有应璩活到魏嘉平四年（252）。这样，“建安文学”包括上下五十几年（175—232）。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则紧步“建安文学”的后尘，颇有建树。

（二）、建安诗或建安文学的土壤

说起“建安”来，对于一般熟悉古典文学的读者是不会感到陌生的。家喻户晓的蜀、魏、吴三国故事，源出于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而该书总共一百二十回，其中最精采的故事多发生在建安时期的六十七回之中^[16]。在《三国演义》一书里，“建安”字样，大书特书，想来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所谓“魏建安”

汉代末年的“建安”时期，一如周末，秦末，是一个极端动荡、混乱的时代，是一个国家万分不幸的时代，是名副其实的令史家愤慨的“乱世”。此时，王纲解纽，皇权旁落，汉献帝亦如春秋战国时的周天子，有名无实，仰人鼻息，任人摆布。一代枭雄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17]，军政大权（其实就是皇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汉献帝只不过是运于股掌之上的一个政治傀儡。对于这一点，当事人心里明白，曹营的人心目中也只有“我大魏”，根本不把汉天子放在眼里^[18]。后代的史家和文人也不讳言其事。《后汉书》作者范曄（398—

445)，可能距当事人年代稍远些，就不象《三国志》作者陈寿（232—297）那样遮遮掩掩，在《献帝纪》里秉笔直书曹操“自为司空”、“自领冀州牧”、“自为丞相”、“自立为魏公”、“自进号魏王”。范曄的史识和史德，是远在陈寿之上的^{〔19〕}。

当时朝野尽知“汉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20〕}。对此，汉献帝刘协很有自知之明，在建安十八年，二十一年的策和诏里，甘拜下风，对曹操评功摆好，如数家珍。还直言不讳地表白心曲：“今君称丕显德，明保朕躬”，“俾君秉义奋身，震迅神武，捍朕于艰难，获保宗庙”^{〔21〕}。

“建安”时期，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时人和后人，也都只知曹操的存在，而不知还有一个名义上汉献帝存在。因而从南北朝开始，就有“魏建安”的说法，虽不合理、不合法，却合乎实际。有些作者，早已“不知有汉”，如沦落北朝的南朝诗赋大家庾信就说过：

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法三变^{〔22〕}。

其后，宋人欧阳修，宋祁撰著的《新唐书》云：

魏建安后汜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23〕}。

到了明代复社领袖张溥竟把“建安”字样，毫不犹豫地改为“魏祖”，就更为直截了当，名副其实了：

魏祖二十二年，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曹子桓辄申痛惜^{〔24〕}。

不必更多地举例，曹操在“建安”时期“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总御皇机，克成洪业”^{〔25〕}的既定的历史地位，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不管你对其为人处世、用兵行政褒也好，贬也好，都动摇不了这铁样的事实。他是属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26〕}我们有理由毫不夸张地说：建安时期就是曹操的时代，时代造就了曹操的事业，曹操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建安诗或建安文学的繁荣昌盛。

2. 天灾与人祸

曹操所处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

是一个时局动荡、政权分割、灾疫猖獗、民生痛苦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多重矛盾盘根错节而不断激化的时代，是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的著名的“乱世”之一。

统治了四百年的汉王朝的末期，亦即曹操（155—220）生活的年代，亦即蜀汉先主刘备为之痛心疾首的桓、灵时期^{〔27〕}，再加曹操当权的献帝时期，正处在天怒人怨，江河日下，风雨飘摇之际。当时，朝政腐败，宦官专权，民不聊生，危机四伏。一场规模空前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一场持久的军阀混战同样不能避免。请看曹操出生前后，到黄巾农民起义（184）这一阶段，正史的有关灾害的记载：

桓帝永兴元年（153） 七月，郡、国三十二蝗。

- 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后汉书·桓帝纪》）
- 桓帝永兴二年（154）夏蝗。九月饥。
- 桓帝永寿元年（155）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后汉书·桓帝纪》）六月，大水。
- 桓帝永寿三年（157）京师蝗（《资治通鉴》）
- 桓帝延熹元年（158）六月旱。京师夏蝗。
- 桓帝延熹二年（159）夏，京师大水。（《资治通鉴》）
- 桓帝延熹四年（161）正月，大疫。七月，旱。
- 桓帝延熹九年（166）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后汉书·桓帝纪》）
- 桓帝永康元年（167）六月，大水，渤海海溢。（《后汉书·桓帝纪》）
- 灵帝建宁元年（168）六月，京师大水。（《后汉书·灵帝纪》）
- 灵帝熹平元年（172）京师六月，大水。
- 灵帝熹平二年（173）正月，大疫。
- 灵帝熹平四年（175）夏四月，郡国七大水。（《后汉书·灵帝纪》）
- 灵帝熹平六年（177）夏四月，大旱。七州蝗。（《后汉书·灵帝纪》）
- 灵帝光和二年（179）春，大疫。（《后汉书·灵

帝纪》)

灵帝光和五年(182) 二月,大疫。四月,旱。

(《后汉书·灵帝纪》)

灵帝光和六年(183) 夏,大旱。(《后汉书·灵帝纪》)[28]

次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184),曹操三十岁,一场规模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终于在全国爆发了。其原因,连最高统治者都很清楚。东汉从安帝开始到黄巾起义爆发,其间各地发生民变达六十七次之多^[29]。汉安帝刘祜自己深知,这是“万民饥流”^[30]，“百姓饥荒，更相啖食”^[31]的结果。天灾人祸，土地兼并，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浪，成为“游民”。游民成为黄巾起义军的重要组成成份。黄巾大起义在遭到包括曹操在内的中央和地方武装的残酷镇压之下，虽然为时半年就归于失败，但是，汉王朝的土崩瓦解、军阀混战、朝野大乱的“乱世”也开始了。

东汉是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最为错综复杂的朝代。东汉的皇帝大多短命早亡，而新即位的皇帝因受人（主要是外戚）操纵往往选用年幼无知的^[32]。这样，君权势必旁落到皇太后和外戚之手。待一旦小皇帝懂事，又不愿意受制于人，于是乎就只能依靠他身边的宦官，向外戚夺取权力。等到这个短命皇帝一死，外戚宦官之间又故技重演。东汉自从和帝刘肇于公元92年同宦官郑众密谋，夺取外戚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旋即迫令自杀，宦官参与朝政以来，一直处于宦官、外戚交替专政的局面^[33]。到了桓灵二帝时期，宦官的气焰冲天，更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显赫的宦官，在桓帝刘志时，有“五侯”^[34]；在灵帝刘弘时，有

“十常侍”^[35]。范曄在《后汉书》特立“宦者列传”，说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宦者列传序》），是一点也不过份的。曹操的祖父曹腾就是一个“奉事四帝”的大宦官^[36]。最后一轮的宦官和外戚之争，两败俱伤，董卓坐收渔人之利。

下面介绍一下建安诗产生时“人祸”一方面的历史背景。

（1）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

公元189年4月，汉灵帝刘弘病故，年仅十七岁的皇子刘辩即皇位，是为少帝。其母何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何进（何太后之兄）独揽大权。何进先杀宦官小黄门蹇硕，取得“西园八校尉”的指挥权^[37]。本拟彻底消灭宦官集团，无奈何太后不许，因为她是由宦官的举荐才受到灵帝宠爱的，对宦官一直想感恩图报。于是何进调动西北豪强、并州牧董卓的军队进入京城洛阳，以胁迫何太后，从而根除宦官势力。不料事机不密，8月，宦官张让、段熲等先发制人，杀死何进，并劫持少帝及少帝之弟陈留王刘协出走。董卓兵到，迎少帝还宫，并改元“昭宁”。董卓一进入洛阳，就显露出妄想称帝的狼子野心，并且独断专行，嗜杀成性，秽乱宫廷。是年9月，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改立年仅9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改元“永汉”。又鸩杀何太后（少帝之母）。11月，董卓自为相国，把持朝政。

董卓是一个残酷而野蛮的大军阀、大野心家。大屠夫刽子手。为人“粗猛有谋”，“以健侠知名”^[38]，并且“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39]董卓在

洛阳横行无忌，作恶多端，甚至“奸乱宫人公主”^{〔40〕}。还纵容士兵“突其庐舍，剽虏资物，妻略妇女，不避贵戚”，一时洛阳城“人情崩恐，不保朝夕”^{〔41〕}。董卓统率的西北军构成复杂，内有胡、羌的雇佣兵，军纪废弛。《三国志·董卓传》记载，一次董卓派兵到阳城（今河南登封）去骚扰，正赶上群众社日祭神，就砍下男人之头，系在车辕上，再把妇女、财物用车载回洛阳，号称“攻贼大获”，欢呼“万岁”。当时目击此举的女诗人蔡琰在其《悲愤诗》中，对此有深刻地描述：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诗家和史家的记载，惊人地相似。

（2）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董卓倒行逆施，怨声载道，被群起而攻之。公元190年春季，关东各州郡以渤海太守袁绍为首组成讨伐董卓的联军。十几路诸侯“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42〕}，曹操代理奋武将军，参预其中。一时阵容可谓壮观，无奈联军的各个首领心怀鬼胎，都不愿贸然出击。诚如曹操在《蒿里行》中所说：“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根本不象用兵打仗的样子。只有曹操涉世未深，不计得失，孤军迎战董卓，结果于汴水（今河南荥阳）遭到惨败，他本人也为流矢所中。董卓面对这种形势，悍然挟持献帝刘协迁都长安，洛阳遭到一次无情洗劫：

车驾西迁，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悉驱徙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43]。

时年十四岁的建安诗人王粲，跟随难民一道迁往长安，使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苦难，有了切身的感受。

公元191年，董卓自为太师，号为尚父，位在诸侯王之上。“宗族内外，并列朝廷”，俨然其皇帝也。董卓在长安法令苛酷，滥杀无辜，被诬冤死者数以千计，“百姓嗷嗷，道路以目”^[44]。弄得上下离心，人人自危。曹操的《薤露行》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史实。

公元192年，司徒王允与董卓部将吕布合谋杀死董卓，并灭其家族。长安人闻讯庆贺，载歌载舞，欢呼万岁。可惜，王允没有做好善后工作，对董卓部下十万余人不愿赦免收编，坚持要解除武装，因而遭到董卓部下李傕、郭汜的强烈报复。李傕、郭汜率军攻入长安，杀死王允，屠长安城并纵兵劫掠，官吏百姓死者万余人，长安城遭到严重破坏。年已十六岁的王粲再次从“乱无象”的长安逃出，前往荆州投靠刘表。嗣后，李傕、郭汜又相互火并，于公元195年在长安一带大战数月，死者数以万计，长安城几乎成为废墟。请看北宋大史家司马光的记载：

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饥馑，二年间，民相食略尽。

是时，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